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港台学人系列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 王尔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王尔敏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港台学人系列)

ISBN 7-80149-842-9

I. 中… II. 王…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591 号

大陆版自序

今日有幸将个人昔年研究著作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刊印问世，与国内学界同道有所相遇切磋，自是深感欣慰，引为荣宠。大致在十余年前，承北京中华书局，将拙著《淮军志》印出以饷国人，宗旨亦在于学术之广为流通，彼此大有进益。本人深信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既已出手问世，即为天下公有，并未抱定敝帚自珍之念。惟久承国内名家厚爱，于拙著揄扬有加，深感各界之礼重。学界先进若李侃、王戎笙、汤志钧、姜义华、夏东元、张宪文、张海鹏、王庆成、耿云志、刘德麟、陈东林、胡守为、陈胜彝、韦庆远、林庆元等，以及近年所结识顾卫民、易惠莉、忻平、熊月之、李景光、张海林、江沛多位具富厚学养者，相与诘谈中国近代重大问题，无不针芥契合，备见共识，实亦学术交流沟通之盛事。

鄙人自 1950 年起学习研治历史，得先师郭廷以先生亲教并属命我研究近代军事史，举凡早期所著之《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及《淮军志》二书，皆承郭夫子亲加指定论域，且亲为校订润色，吾敢大胆自承为军事史家，自信于清代之湘军、淮军、勇营、练军皆具史乘贡献。吾另一书《清季军事史论集》即包括以上所述问题。敬求学界先进指教。

吾于学术界所受同道共相肯定者，更在于多年所作近代思想史之著述。此亦吾追随先师郭夫子而以个人努力所开拓者，早启念于前期游艺于师门期间。无论出以勤奋努力或学问兴趣，生平

所研治应以治思想史投界心血最多。所撰论文在五十篇以上。不需多言，中国学界于我治思想史之肯定实久蒙同道青睞。近年相遇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承其特识，来函征求出版本书。一则感承贺先生厚爱，一则藉得与多数学者观摩切磋。吾固当视为一个请教良机。

吾为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重在此一时代人物共趋之意识观念，乃是原于外来冲击，以致产生反省与醒觉。其立即之实质意义，俱启动于因应时代困局，实即强大外敌侵略压力，政治外交经济制度面临崩解之危困，有待改革加强，自全出以拯民之贫救国之弱之识觉反应。实可由此测知中国民族之智慧能力，所当于世势巨变之强大冲击，表现其自觉自救之警醒因应。

吾之研究近代思想史，乃注重于一般时代创生观念，尤切于国人思想之广度与全面性，任一思想观念，于前史任一时代构成国人共识。举例而言，若西学源出中国说、中体西用论、托古改制论、贵因论、中西调和思想、商战、实业、招商、不缠足、以夷制夷、治外法权、幼童出洋、格致、西学、新学、不平等条约、文明排外、变法、立宪、议院、开明专制、强人领袖，而具一代思想中心主流，则可以富强二字概括。甚至文学改良、国语运动，亦俱为富强而来，实本之于救亡观念，危机意识，而出以唤醒民众以图警告国人之奋起抗敌自救危亡。盖近代思想主流动向，全面归趋，自定命之为富强运动。吾生平努力于近代思想研究，重点即在于澄清此诸类观念之内涵意识，固深信其代表此一重大时代。吾之思想史论著，自以解析各个思想观念之创生形成为目标。尤重在于观念之创生的年代，“商战”一观念之创生于1862年，即为鄙人考订而得，当可自本书查知。

此一时代思想先驱人物，百余年中无虑三百余家，吾为时代思想内涵而用心，则所研究，一向着意于思想观念，以此为中心宗旨。惟亦未尝薄视个别之思想家，其中每每列重点而讨论者，

若先驱人物研究王韬者不下四篇，研究孙中山者达十余篇、郑观应者二篇，其外若姚莹、郑复光、薛福成、张謇、张之洞者各一篇。惟相关于特出之主张思想者，虽未以人物为主，而其内涵则专括纳于一二人者，若言商战必集中于郑观应、汪康年等人，言公仆必集中于严复、孙中山，言德智体，智仁勇，必集中于严复、张之洞；言开明专制必集中于严复、梁启超，言主权在民者，必集中于孙中山。各样专论俱能突出其人物表率。总而言之，吾虽以研究时代思想观念为致力重心，实亦并未忽略此时代中之思想先驱人物。就全时代人物之风起云涌，吾自信生平用心网罗数百位之多。凡能力所及，一定表暴于世，但不敢谓其全无遗漏。在此必申明其中若干重要者尚未表出，若沈毓桂、蔡尔康、刘光蕢、李春生，实早留心多年，却尚未能写入拙著，深感遗憾。

综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时代反应与所表达之救国思想，俱能见其智虑超卓，思辩精审，充分可信其高明之识断。早在鸦片战后，1844至1847年，林则徐与魏源已提出其因应世局之定见，是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语用于今世，愈见其光照全局。国人可永世奉为圭臬。由此例以观，则中国代有才人，其智慧超卓可期，自亦富强可达，复兴有望。

此书得以刊行国内，就教于当世贤达。特须感谢几位热心学者，三年前首创其议者为贺照田先生，又因缘黄克武教授、张寿安教授推毂引介，使拙著荣列于学术思想参考之林。余自深感荣幸，亦感念三位学者之厚爱。在此特申感谢。至于全书内容、观点，俱出于诚笃之钻研，当自负全责。同道批评指正，尤所欢迎。

王尔敏手记

二十世纪之尾年（2000年）季夏七月十二日

写于多伦多市之柳谷草堂

目 录

叙 录	1
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 新观念	1
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	80
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	140
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177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198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	323
“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	370
附表：先秦典籍所见“中国”词称汇录	387
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时代意义	401
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	433
征引书目	453
本书作者所著其他有关思想史论文目录	469

叙 录

自从1969年印行一种论集：《晚清政治思想史论》，随后终觉尚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必须继续努力，从事钻研，可以逐渐使近代思想史显现一些粗略的轮廓。接着7年时间，又写了十余篇思想史论文，多半是大篇幅，现将先完成的九篇集成这本书，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则是急需补充前一书所未解决的问题。二则是负责地呈献我在近代思想史方面一点耕耘的成果。

20多年来，可以说我是从事近代思想史研究，并留心历代思想变迁。虽然已著文不少，但仍以开路小工自视。一来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原是在开辟荒芜阶段，还没有形成全面建树的基础。二来我个人不敢自登堂奥，一直盼望有更精密博大的近代思想史家出现，利用前人个别问题的研究，而建立起完整体系。起初我是迫于研究近代史的需要，而先从事思想史探讨，结果被牵引半生，难能罢手。终于不敢写出一部近代思想史。自叹才资不及，学养不足，尚不能拟具近代思想全局结构，只有再拖延若干岁月，或竟期待后贤的完成。中国史家优良传统，在尽学者天职，其生平勤恳撰述记注，无非为守先待后的想望，使一旦有贤哲出现，而取来用为著作的资材。这是我研究近代思想一个基本的并且稳健的计虑宗旨。

我个人研讨近代思想史的态度，基本上原由于急切需要了解。因此是非常盼望快速地发掘与解决各项个别问题。这在最近六七年来，略有较满意的成绩。除了我个人撰写十余篇论文之

外，同道学者陆宝千先生曾探讨了近代公羊学及清代经世思想等重大问题，他已撰思想史论文不少，亦在计划出版论集。吕实强先生曾探讨了近代思想先驱冯桂芬，以及争议关键近代儒家与维新思想问题。此外尚有其他同道朋友处理 19 及 20 世纪各项思想问题，并有不少新作问世，不及一一引述。由于在这期间我曾指导一些研究生撰写硕士论文，我的门人王文发完成了《中国近代的墨学复兴》，许弘义完成了《国学保存会研究》，萧人英完成了《谭嗣同的生平与思想》，江勇振完成了《张君勱思想评述》，陈炯彰完成了《近代农业改良思想》。虽然距离目标尚远，但对于准备后人来撰写综合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确是加快实现的可能。我个人力量不够，我的许多同道朋友和学生却同样尽了推动的努力。我愿近代思想史研究，可在一个短时期内留下来重大的贡献。目前我自然仍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在史家守先待后的职责上言，我无愧于后世中国学术。出版这本书，也正是一点小小的告成。当世贤豪，能者尚多，凡致力近代思想史研究，如非冒滥剽窃，都要尊敬为同道，尤深望其指示教正。至一时代共同之贡献，凡有所知，亦必心仪而崇敬之。

在此再略为声明一点我个人探讨近代思想史的用心之处。我所注意把握追寻者，在于一个观念创生的契机。往往一些粗浅的创意，却能构成思想的先驱。无论它合理与否，是否荒谬，却均值得追究。大凡思想的创意，起初多半是粗略宽泛而具有新意境。它的特色在表现多样矛盾、杂驳而富有包容性，尤其具有潜在发展趋势。嗣后的发展延续，多恃深密思考的学者继承，可以笃信而专致地加以系统化，终于建立一套体系。至再延续伸展，则不免自然形成分流，是即所谓思想流派。

然而近代中国思想，其所表现五光十色，令人目炫者，不但流派分歧，而尤显示创新观念的活泼勃发，此起彼落，同样是棼如乱丝，极费考察。当此一代思想敏觉的知识分子，凭其智慧信

心与责任感，往往事先发现并指出时代病征或疑点，虽然仍是反映时代心声，但在警悟性而言，可以说提出超时代的思想方向。这种超越时代的敏觉以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思潮，正是我做研究所要发掘和探讨的。

同样的用心之点，我也如同一般常识的了解，对于思想发展的时代高潮也十分留意，决不会轻轻放过，只是一般常识或许略知时代思潮爆发的热闹，而却完全不知道它创始的契机。我对于这些，自然都看成史家的重大责任，对于前人后世，这都是严肃的学术使命。举一个简明的例：全盘西化论在1898年为创生的起始，在1930年代是爆发高潮的顶点，两者各代表不同的意义。一般常识或许会知道1930年代那回子事，思想史家就必须原原本本前后探讨清楚。如果你使问题澄清，后来诈伪之徒的抄袭旧套，即使大声疾呼，鼓吹提倡，你也会清楚看出这只是欺世盗名的伎俩。治思想史的学者有一个重要的基本责任，就是澄清一个时代一切思想理念的意义，追究各个理念的根源与其时代的关联性，以及评估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

至于在一个时代众多人物中选择其代表性者，自应着重在思想观念的时代意义。无论为保守为激进，为复古为维新，为传统为西化，五光十色的诸般主张，要点重在代表真实的时代心声，反映一时代真实的意念想像。但就选择而言，实须依恃深厚的历史知识，须真能熟习一时代重大史事关节。因为资料之庞杂，所呈现的陈腔滥调，拾人牙慧，投时髦风气，夸诈欺世种种言论，一概混迹其间，必须耐心选择，判断取舍。像这样连篇累牍的资料，如经审慎鉴别，可能等于一无用处。而审慎鉴别的学识能力，自然必须长期培养历练，因此使我不敢不努力向学，以求一日之长，尤其感觉没有满足的时候。

思想史是现在史学家不可缺少的知识，甚至也构成某些史家所不可缺的研究论题。我个人经验，是为解释近代史的需要而从

事近代思想史研究。先是自己，后是为他人，说得更光朗一点，也是为后世学术。思想史较哲学史之体系完密当是大为逊色，但是范围宽阔，包罗深广，重点尤在思想与人生社会种种活动之直接关系。同时也较所谓伦理学宽广，不止要探讨伦理思想，而同时还要涉及人群精神状态全部。合理的思想，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固然要探讨，而一般心理反应，意趣风尚，以至习性感染，也同样要加以探讨。甚至于往往不合理的情绪冲动，对于历史变化，会更具重大影响。这如何可以忽略不谈。基本关键，史学家治思想史与思想家的讨论批判思想有相当不同，虽然两者同样讨论思想，无论立场、方法、目的均不相同。大致说，思想家在批判与辨析概念之是非、正误、真伪，以至精确的定义。而史学家的研究，则多注重它们的性质，时代意义，以至影响的范围。

我个人研习思想史，另一个副目的也是在教育自己，锻炼超然的观察能力，历练缜密的辨析问题的习性。同时也可以培养追逐抽象思路的耐心。从过去经验中的受益，使我领悟到思想之泉愈发愈旺，可以长用不竭。所见问题愈多，解决的意愿愈强，而承担的学术使命感也愈觉重大。我个人终于不能不抱一点负责任的野心，那就是要与同道师友们把近代中国思想先作一个初步的全面发掘与澄清，以便后世贤哲用为著作的资材。

对于出版这本论集，可以再声明一点个人的自私意愿，那就是到明年我就是 50 岁，一则作一个学识修养的回顾，一则顺便作一个纪念。我的学问得自师友的熏陶很多，十多年前（1964 年冬）我在英国时写下两句话：“一个学者最大的幸运是：有师友砥砺，无人事纷扰。”我正可以自认是这样的幸运者。看看司马迁的悲慨，刘知几的愤叹，我觉得我的同道师友真多。在此需要感谢先师郭廷以（量宇）先生，以及在思想史方面受益最多的刘殿爵先生，刘广京先生和郭颖颐先生，并感谢我曾多次请益而



深获谈慧的杨联陞先生和饶宗颐先生。

此外我必须郑重向台大医院眼科主任张荣茂教授表示万分感谢之意。他先在 1966 年医治好我的眼疾视网膜剥离症，又在 1970 年医治好我的眼疾玻璃体破裂出血症。到今还能阅读图书，撰写论著，全然是承受张教授小心维护的恩惠。

本书多承好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先生的悉心筹划，并承学长汪中先生题署，在此一并深致感谢。

最后要表达我一点思亲之情，就是在外流浪近三十年，没有得一天机会孝敬母亲和照顾诸姊弟，在人伦上是一大缺憾，永世难赎的罪疚。家母七三高龄，思念游子更切，暮年孤寂，更不堪其凄苦。这真是人生中一大悲剧，令人不敢回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之晚六时

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 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

近代中西接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联键。自鸦片战争起，中西接触频繁，西方器物知识大量输入。中国朝野人士所见所闻，为亘古以来所未曾经验。中国人凭藉历代累积之知识能力，与新人群、新事物、新体制接触，往往不免产生许多误解，但也未尝没有直觉的偶合与推理的解悟，并逐渐达到洞悉真象的程度。统观近代中国历史，诚然表现着中西冲突的纷乘。战争与交涉，仇视与疑惧，复杂的历史事件，足以耗竭历史家费力的分析描绘。但是在思想层面，也在同时期各个不同发展段落，遗留下丰富的果实。

自 1840~1900 年的 60 年间，是酝酿近代思想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发展段落。这包括全部新概念之吸收、融会、萌芽、蜕变的过程。思想的创发，有加速趋势，也就是说一直维持着扩张的动力。思想的内容，多样而驳杂，不免被后人视为幼稚浅薄，但它确代表这一时代人真诚的理念与想像。在此 60 年间，中国人对中西关系之反应随时代进展而有四个阶段可寻。每一段落思潮之涌现，皆为当时历史发展之结果，亦皆具有开辟新方向的意义。此四段落为：① 1840~1860 年；② 1860~1880 年；③ 1880~1895 年；④ 1895~1900 年。各个段落，都有新观念出现，其历史意义与其对下一阶段中国思想演变之影响，皆极深巨。

中国人在这 60 年间的对外态度，由于各时期中外关系的变化很多，再加上每人理解的深度不同，因此在同一时代的对外态度仍显现矛盾和繁复的情势。笼统的归纳大概性质，约可分为非理性的与理性的两种态度。非理性方面所表现的是先入之见的排斥，对新事物歧视、厌恶与诅咒。即勉强被动的适应，因客观形势的需要而被迫正视现实，也并无创造性之反应，真正态度改变甚为缓慢。在理性方面则不乏创造性之反应，先经主观的体会与选择，再益以推理与联想，虽常不免曲解，但有时亦竟达成真实的领悟。具有理性之官绅并主张折衷与调和，使固有知识与新观念融合一致。而同时更有人歆慕西方新知，主动吸收并予传布。这 60 年间的思想变化，究竟是中国社会中哪一群人为主体？无疑地可以确定说：是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士大夫^①。但是到了 1900 年以后，这个主体就逐渐改变。

19 世纪中国士大夫之认识西方，先后表现三种不同程度，虽然有时间的先后差别，而在事实上仍然共同存在，平行发展。第一是因中西接触而生之认识与感想，无论为正确为错误，只是一种初步的反应。第二是中国官绅在面对因有中西关系而产生之问题时所衍生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显然是近代中国独有的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尽同于西方近代。第三是移植西方固有观念，以吸收为中国人自己思想的重要成分。这三种程度，就各别分量比重而言，有显著的时间差别，却并不是前后连接形式，而是三者平行发展，由时代的推进，可以看出消长的趋势。

本章讨论中国官绅对中西关系之态度，乃依照各种新概念衍生之先后次序以及新概念之内容，划分段落，加以分析。虽然各种新观念在中国士大夫中普遍接受之程度，目前史家一时尚未能作准确之“量”之估计，但著者认为即“质”之分析，对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已可有其贡献。

一 初步认识与反应 (1840~1860)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传统，足以影响士大夫对外之基本态度。其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其二是戒勤远略的历史教训。这两种传统均有深远的背景。历代累积的经验，造成中国人素来具有一切自足，无待外求之心理。此种心理之背景，简单说来是：①自商周以来政治文化的创造发展，一直维持一个中国中心的形式，即遭外族武力扰乱或征服，惟因外族之迅速汉化或崩溃，王朝之观念并未改变。②中国从历代经验了解到天朝对外武力扩张的害处，即在汉唐两代，士大夫亦常会有消耗国力民力的警言。③在经济上中国素不希求外国商品，人民日用所需，可以完全自足。因此种种客观情形，中国对外态度，乃不求积极主动了解域外情形，而对域外来华之人，尤其是商人，既不完全摈拒，亦仅应付容忍而已。通商虽然彼此有利而政府并不重视。此种对外态度，形成一种消极的策略，就是所谓“羁縻不绝”。中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自然蒙蔽了对外的真实了解，而对外羁縻的策略，亦实不足称为真正的外交政策。基于此种悠长的背景，中国在适应中西接触的初始阶段，自然不免产生许多误解和盲目的政策。就常识所了解的事实，英国于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 (Lord Macartney) 与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 (Lord Amherst) 先后来华，中国方面并未认真了解英国国力与国情，仅仅单方面重视朝贡制度下礼仪细节的要求，迫使对方就我范围，终至失去两次沟通双方正常关系的机会。因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与西洋虽勉强维持在广州之商业接触，但整个说来，中国之国策乃不免自我锢蔽。

中国对域外了解，第一步骤当自接触来往开始。而在初期若干人的主张见解，则是尽量避免中西间非商业性的来往关系，仍然保持深闭固拒的态度。此种态度，即在鸦片战争行将结束双方

议和之际,以至平时中外交际之时,仍然存在,足见其根基之深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842年8月17日)耆英在主持议定和约,说他要亲见英人,道光皇帝则批示他以不见面为好^②。日后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846年5月8日)赛尚阿所提出的对外办法,是预绝其求见之路,也是彻底断绝接触的政策^③。很显然,这一种隔绝中外的主张,必定构成对外认识的障碍。这种观念之存在于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与重要官吏间,自然会具有强大的效力,阻滞中西关系之演进。

但是清廷的隔绝意愿,不能阻止西方的冲击。中国门户被动地逐渐打开,承受对外来往。五口通商并许传教,自然在表明这种事实。但是既有中外接触,自亦不免产生初步的误解。先自外人状貌而言,欧美人士显与华人有别,皙肤、赤发、碧眼、深目、高鼻、虬髯等等,与衣着紧身,躯干挺拔,均易引起许多奇异的印象与误解。这在鸦片战争前后保留下不少类似的记载。汪仲洋有诗咏其所见,以为英国人是鹰嘴猫眼,红色须发,腿长,只能挺立,不能超越腾跑;眼睛绿色,畏惧日光,在正午时不敢睁眼^④。裕谦则数次明白形容英人是腰硬腿直,可以一击便倒^⑤。但在反方面冷静观察,据情理推断,也颇有人驳斥这些错误的印象。萧令裕据所亲见,洋人登山涉水,十分矫捷,用而举实反证。包世臣则据情理推断,英人本来生长陆地,当不信传说所谓西人一登岸上即无所能为的印象。^⑥

19世纪中西关系,原始起于通商,在华所习见,则洋人所需中国货物以丝品、茶叶、大黄为大宗。中国官绅从肤表了解,竟转折推出一些荒谬理论。再加彼此传告解说,无不信为真实。外人贩运茶叶、大黄,是一显著事实。两物为外人所需,当是情理所必知。但若因外人需用之物,即进一步判断为关系洋人性命,其推理自不免流于荒谬。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官绅与民间大多确信茶叶大黄系英人必需之物,一经断绝,即有瞽目塞肠之

患。当时有此言论传于后世者当不下 20 人之多，足以显示其代表意义^⑦。不过在众情一致之外，同时代中尚有清醒人士，立言驳斥这种误解。例如黄恩彤与魏源认为洋人需茶，在嗜好品味，实无关于生存问题^⑧。

对外误解，自然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在中国思想转变时代，足以阻碍创造性的对外反应。不过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官绅士庶的反应检讨，并非完全麻木停滞。事实上，国人对外之认识，当时曾有若干程度的醒觉，并有具体可见的进展，中国初期对外反应的主体，包括两种显著的态势。先是向外对现实世界的求知，也可以说是寻求应付外人的手段。最终则引起国人因中西比较而有内向之反省。然而向内反省与对域外知识的探求，实为同一行动的内外两面，两者紧紧互相关联。凡经对外接触，知能的取得与内心的感悟，往往同时发生。

鸦片战争之刺激引起中国士大夫间两种知识方面发展的动向。第一是对于西方兵船火器的认识，以及基此认识进而追寻机械火器知识。另一个则是对于异国人物风土的接触，以及由此而增长域外地理知识的探讨。

中国官绅对外洋兵船火器的认识，可见于一时盛行的“船坚炮利”之说。在现有的文件资料中，可以确知，有 66 人具备这种观点，包括道光皇帝在内，全部为高级官吏和一些著名的绅士^⑨。由于对西方如此认识，遂产生国人自身的反省与要求。一种强烈的动机，趋向于火器机械学的研究与发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1843 年 1 月），魏源完成《海国图志》初稿 50 卷，其中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火器局，并雇法美两国工师，带西洋工匠前来制造，并教习驾船演炮；同时又建议科举项目增加水师科，能造轮船枪炮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轮船施放枪炮者为行伍出身。而水师将官均必须由此途升转。这当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早的先驱意见。^⑩至在同时代所重新刊印的传统兵械火器著作

不计算在内，其一般研讨西洋火器及自创新法者，包括造枪炮者 7 种，其作者有丁拱辰、龚振麟（二种）、汪仲洋、梁章钜（二种）、西拉本等。造地雷、水雷、炸弹者 6 种，其作者有黄冕（二种）、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高邦哲等。造炮台者二种，其作者为黄冕、叶世槐等。造火药者二种，其作者为丁守存、陈阶平等。讨论一般火器攻防者 5 种，其作者有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祁元辅等。共计达 22 种。^⑩这些成书，大部分完成于 1840~1850 年之间，最晚亦在 1860 年以前。无论价值如何，却表现了中国官绅对于西方器物主动研讨和真诚接受的意愿。至于观察西方火轮船而记录介绍者亦在 10 人以上。其详细解说而著成书者则有郑复光所著的《火轮船图说》^⑪。这些显然都是因为西方器物的直接启发，而开始引起内向之要求，即应改变中国原有之军事技术，由中国人自制西式船炮。

再次就域外地理知识的探究而言。表面上是向外方考察未知的西方世界，乃至更宽广的地球知识。而对积极需要来说，则是充实本身的见识能力，是进一步求知的动力。换言之，此时中国有少数官绅已存蓄一种积极的启念，是要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其所形成的客观因素：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敌人乃来自西欧。此敌人之情况究竟如何？欧洲是何等地方？当急于求正确解答。在这种动力驱使之下，遂形成同时代世界地理学研究的潮流。

中国固有史志，记载欧洲事物甚少。尤其是当世欧洲列强，纪录更缺。较早的世界地理知识，多出于耶稣会士之手，亦仅有三种图说。而 1840 年代以前，中国人自著较为可靠的参考书，仅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 年成书），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806 年成书）和谢清高的《海录》（1820 年成书）。林则徐曾经很清楚地在 1839 年参考《海录》，用以了解英国国情^⑫。但是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官绅逐渐注意到外国地志的研究。从事探讨，著为文字图说，介绍国内，前后著成之书，至 1861 年以